



邓 哥 夜 话

邓拥军 年过五旬，外表憨胖，内心柔软，说话、唱歌都操一口纯正的麻柳腔。在达城马路上执勤多年，得过几个奖章，拿过几本证书。一个连“的地得”“定补状”都弄不醒豁的家伙，听说不想当作家的交警就不是好交警以后，业余时间拿起笔来开始涂抹自己的文学梦，随心随喜随记，就当给生活添料加色。

会跨栏的猪

在我的家乡，猪有一个名字——啰娃。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名字，正如人们把我叫军娃一样。这充分说明猪在一个农村家庭里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我家里终于修起了水泥板楼房，在那个年代能修楼房而且还是水泥板的楼房也是轰动乡里的事。但我家也只是修了一个楼房的空壳，很多附属设施因缺少资金都还没有完善，包括伙房和猪圈。母亲那一年就在老屋的猪圈里多喂了几头猪。计划卖了肥猪，加上父亲在城里务工挣的钱，准备再完善新楼房的附属设施。

就在那年夏天，圈里的猪真是长得油光水滑。不知道什么原因，早上喂猪的时候同圈的两头正在长架子的黑猪都还是肯吃而且是活蹦乱跳的，在吃了早餐以后，先后倒地气绝而亡。母亲嚎啕大哭，六神无主。我小时候也曾有头疼脑热的时候，也没有胃口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母亲并没有哭泣，而两头猪的天折，竟让母亲伤心了好几天。母亲是一个情感内敛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唤过我一声“幺儿、狗儿”之类的爱称，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在母亲心中，我这个军娃没有猪圈里的啰娃贵重。

隔房的叔父是一个极具生活经验的人，赶忙点燃了家里的大灶，烧水把两头猪给刨了。我和叔父背上那些“瘟猪肉”走村串户去售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食品卫生也没有今天要求这么严格，用白菜价就能买上猪肉打一顿牙祭，并且还可以赔账。因此人们也并不拒绝这种“瘟猪肉”，这其中或许也有大家伸手相助的原因。叔父硬是用两头猪的“瘟猪肉”给我们家换回了十多块钱，至少又有了再去买一头小猪崽的头钱。

没卖完的猪肉，叔父也有办法处理。炖的、蒸的、炒的，用不同的烹饪方法，大锅猛火，再用辣椒、花椒、泡菜、豆瓣酱等香辛调料去掩盖“瘟猪肉”的腥膻。那一天我是把猪肉吃饱了，至今想来还是美味。只是母

亲没动过一下筷子。母亲如失去了孩子的祥林嫂一样总是在嘴里念叨：“都怪我喂南瓜叶喂拐了。”

猪的死亡与南瓜叶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问了已经是畜牧兽医的儿子，儿子才给了我一些科学的解释：如果天气干旱，忽然下了一场大雨，那么这时候南瓜藤从土壤中吸收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往往就贮存在南瓜叶中，把这样的南瓜叶拿来喂猪就极有可能导致猪发生急性亚硝酸盐中毒。

那时候我和母亲都不知道这些科学，母亲以为是老猪圈离我们的新家太远，风水不好了。后来，母亲特地从娘家请来了手艺精湛的老木匠，母亲要在新房子的旁边重修猪圈，用新猪圈去改变风水。那老木匠是我母亲的族亲，按照母亲的辈分，我还应该叫那木匠一声外公。猪圈落成那天，木匠唱了四言八句，随口唱来句句押韵：良辰扫财门开，斗大黄金滚进来，主人做事多慷慨，六畜兴旺猪儿乖，吃得快来长得快，主人硬是喜心怀，年年肥猪惹人爱，万事顺遂无病灾！木匠唱毕还在猪圈里贴上了他用黄表纸画好的几张符咒。母亲这时也会拿出早就用红纸封了的喜钱，恭恭敬敬地用双手呈给了木匠，这是“扫猪圈”的仪式。在仪式之后母亲还要烧几道好菜招待木匠。母亲早就多次叮嘱我，要我那天少说话，不乱说话，特别禁忌不吉利的话。我只管拿出肯吃的架势闷头吃就行，要吃得桌上的饭菜一点不剩。当然，因为是一种仪式，母亲也有意减少了饭菜的份量。

说来也怪，自此以后我家喂猪就顺趟得很。养的猪就如我一样，吃嘛嘛香，能见风就长，膘肥体壮。

前几天和母亲聊天，母亲又聊到了我年少时的一件趣事：

小时候，有一天母亲去赶场，用背篓背回了一头小猪崽。母亲快要进家门的时候，

她就大声叫我舀点水出来。我想，是不是小猪崽把屎拉在了背篓里面了，母亲要用水冲洗背篓里的猪屎？我就用家里的大水瓢从水缸里舀了满满的一瓢水端给了母亲。母亲盯着我端出来的那一瓢水，当时她的眼睛都发绿了。但是她还是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地接过那瓢水，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满满的一瓢水呀，母亲硬是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我也是十分诧异地盯着母亲，难道是母亲走累了，走渴了？待母亲喝完水以后突然向我咆哮：“你个花花儿啰，叫你舀一点水，你硬是舀上满满一瓢，你是想把我胀……”

母亲生怕不吉利，终究没有说出那个令人忌讳的“死”字。母亲一边骂一边又有了拿起水瓢要打我的架势。我也是懵了，我好心好意地舀来水，得到的却是一顿臭骂。我见母亲要打我，只有飞也似地跑掉，越跑母亲越是紧追，我慌不择路，竟然一下子跃过了院子门前的竹篱笆。我一边跑一边想母亲是不是在赶场的路上闯了什么煞气，疯了？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在小猪崽入圈前喝一点水的缘由。

母亲买回猪崽，在进门的时候为了讨个吉利，就要先叫屋里的人舀点水出来，再一口气喝下去，这就预示着买回的猪崽肯吃肯长。喝点水只是个象征意义，是一种仪式，那是母亲在虔诚地祈祷。哪知我不懂这规矩、不懂这仪式，舀了满满的一瓢水给母亲。那时猪在我家的地位如同家庭成员一般，是全家生活的希望，是一年的盼头，是不能有半点闪失的。母亲为了全家有个好光景，硬是将满满的一瓢水一口气喝完。母亲充满爱意地追着我打，那是她觉得我又可气又可笑。现在讲来，母亲还总是笑个不停。

有些事情真就有这么神奇。那一年，我家养的猪就十分活泼好动，总是在不经意间就会轻松地越栏而出，那猪跃过猪栏的姿势，如同我那天轻松地跃过院子里的竹篱笆。

双女儿呱呱的诞生。母亲对妻子讪讪地说：“媳妇啊，我们家就这个样子，我和你爸爸年纪大了，想盖砖瓦楼房，这辈子是没有能力了，只有靠你们自己去努力了。”妻子笑着对母亲说：“妈，只要我们两个不好吃懒做，凭自己的一双手，一定能有自己的砖瓦房子的！”

温暖的土屋守护着女儿一天天成长，也时常传出妻子、孩子与我喜乐的笑声；也是在这温暖的土屋里，让妻子有了一份信任鼓励的眼神，她陪着我一起阅读写作到深夜，还不厌其烦为我打扇，驱赶夏天的酷热和蚊虫，让我实现了心中的梦想。

二十八年前，妻子女儿随我到工作的乡镇定居，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头几年回家，土屋里面还住着堂哥一家人，土墙房子保持着我们离开时的模样。又过了几年回家，土墙房子门被锁着，屋檐边的瓦盖已被山风掀翻掉地，角板被雨淋腐蚀断裂，墙体形成了多条沟槽。

……

看着在新楼面前发愣的我，母亲说：“土屋倒塌那天，幸好旁边没人，紧挨的邻居吓得一场虚惊！”父亲接着说：“你堂弟在外挣了钱，就在老屋基上面修了这三个门面的楼房。”

温暖的土屋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段缩影。伴随着新时代滚滚车轮的碾压，土屋随之消失殆尽，展现在故乡村庄的是一栋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楼房！

温暖的土屋

□吴兴华

国庆回老家看望父母，来到一栋三层新楼房前，不禁思绪万千。这里曾经矗立着的两间土屋，是我青少年时蜗居的避风港，藏有我一段挥之不去的温暖时光。

我的童年，居住的那间土屋是爷爷奶奶分给父亲的。随着妹妹弟弟的相继出世，土屋里添加了欢乐和忧愁。愁的是我和妹妹弟弟一天天长大，一间土屋实在住不下去了，父亲只好白天拼命专挑生产队最重的活干，期望挣最高的工分，母亲则精心劳作自留地，种些红苕、玉米喂养鸡鸭，生猪。年复一年积攒一点微薄的积蓄后，便有了在爷爷奶奶家旁边的空地上盖两间新土墙房子的构想。

20世纪70年代初期，自留山里只是拳头大小的杂木，修建房屋的所需木料，得前往四十里外的云顶寺找二爷爷求助，买到相应的建房木料。

那些年没通公路，为将木料搬回来，母亲天麻麻亮就煮好早饭，让父亲吃得饱饱的就借着星星的光亮，一路疾行在羊肠小道上。行至中午，满头大汗的父亲匆忙吃过二奶奶煮的一碗面条，便扛着两根百多斤的檩子原路返回，到父亲回家时，已是黑漆漆的晚上。

那时我正读初中，每到周末放假，便随父亲起早床。吃饱母亲煮好的早饭，便跟着父亲过河翻山越岭，朝二爷爷家奔去。每次吃过二奶奶煮的一碗面条后，父亲便挑选一根晒干的杉树檩子，说是晒干了的檩子比较

轻，让我扛着往回走少费些力。

记得第一次去二爷爷家扛檩子那天，一路上我听鸟鸣叫精神百倍，仿佛走亲戚一般乐此不疲。可扛着木料往回走才一两里路，就觉得肩部被压得生疼，双腿像灌了铅一般，走着走着大口喘着粗气，与父亲的距离越来越远，就想将肩头上的檩子卸下，不想住什么新房子了。歇气等我的父亲见我满头大汗，笑着说：“头一次扛木料肩部很疼吧，歇一会儿会好些！”小憩了一会儿，看着前面弓腰一步一步吃力前行的父亲，他扛着两根檩子估计有百十来斤，而我扛着的檩子三四十斤，心里比较之下，我便打消了退缩的念想，忍着木料摩擦压着的疼痛，咬着牙一路尾随在父亲的身后，一起把木料扛回了家。那晚，我像得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周身疼痛。

这样的搬运方式陆续经历了四年多，练就了我的体魄，也筹齐了修房所需的木料，凝结父母心血和我汗水的土屋，于1976年8月落成。那年腊月，我家搬离了桂花坪那间小土屋，住进了爷爷奶奶家旁边新建的两间土屋里。

土屋十分简陋，四周用黏土筑成四方墙体，天盖由木檩子依托，钉上角板，盖上灰色的瓦，住在里面冬暖夏凉。

是这里的土屋，让我读完了高中学业，走出大山，进了军营；是这里的土屋，让我拥有了一个温文尔雅勤劳的妻子，也迎来了一